

# 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

师艳荣

**摘要:** 蛰居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新型青少年问题,也是社会发展及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目前,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日本青少年蛰居者已达数十万人。其类型主要包括性格自卑型、学业受挫型、家教偏颇型和就业遇挫型。蛰居是战后日本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由社会、家庭、学校共同造成的社会病理现象。其产生的社会机理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私性化”的社会环境、核心家庭中“父职缺失”的家庭育子方式、学校教育病理及频发的校园问题等。在综述日本蛰居问题概况的基础上,着重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溯源研究。

**关键词:** 日本青少年 蛰居问题 演变过程 社会机理

蛰居问题发端于日本,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新型青少年问题。其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前后发展成为社会问题。目前,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日本青少年蛰居者已达数十万人。日本社会各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将关注重点放在如何解决蛰居问题上,从而忽略了对其根源的探讨。日本的研究视角以精神分析为主,实证研究为辅,少量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多侧重于案例分析、援助对策的考察。鲜有研究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从影响青少年社会化<sup>①</sup>的社会环境、家庭结构和学校教育方面的历史变迁去探寻蛰居问题的演变过程和产生的社会机理。

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具有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属性。其研究内容之一是“对于某些既定社会现象的溯源研究”(吴忠民,1991:124)。蛰居问题作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是当代日本青少年问题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社会发展及青少年社会化过程<sup>②</sup>中遇到的难题。在对蛰居问题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同时,同样需要有历史的视角与思维。为梳理蛰居问题的演变轨迹,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机理,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社会学的深层透视。本文区别于先行研究中已有的视角,综合运用社会变迁和青少年社会化等理论知识,在对蛰居问题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溯源研究。

## 一、蛰居的概念与相关文献综述

### (一) 蛰居的概念

蛰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立场和视角的差异,有关蛰居概念的界定存在多种版本。其中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官方的界定。官方的界定主要指日本厚生劳动省和内阁府的定义。二者的界定标准不同,前者主要根据“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的有无”,后者的判定标准是“外出的有无及其频度”。

2010年5月,厚生劳动省在公布的《关于蛰居的评价、援助指针》(以下简称“新指针”)中,将

<sup>①</sup> 所谓“社会化”指帮助成员逐渐从“生物人”过渡到适应某个具体社会的“社会人”。参见杨雄、苏萍,2009,《转型社会的中国青少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up>②</sup> 社会化过程指人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学习社会知识、技能和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培养社会性,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过程。

蛰居概念界定为“由于各种各样的要因,回避社会活动(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上学、非正规雇用的就业及家庭外的交际等),原则上是持续6个月以上基本不外出的状态(包括与他人不交往的外出行为)。另外,蛰居在原则上与源于精神分裂症阳性或阴性症状而出现的闷在家中不出门的状态不同,它并非是一种精神疾病现象,需要留意的是,在没有进行确定诊断前,蛰居者存在具有精神分裂症的可能”(齋藤万比古,2010)。该界定明确指出了不能忽略因精神疾病而导致蛰居的可能,即蛰居者中不乏存在精神障碍的人。也即说,蛰居包括“社会性蛰居”和“精神障碍性蛰居”。迄今为止,“新指针”对蛰居概念的界定成为日本社会各界使用率最高、最具权威性的定义。

同年7月,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关于年轻人意识调查(蛰居的实况调查)报告书》中对蛰居概念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划分。狭义的蛰居包括三种情况:基本上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房间里出来,但不外出;平时在家,偶尔去便利店等场所。准蛰居指平时在家,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才外出。狭义蛰居和准蛰居之和就是广义上的蛰居(内阁府政策统括官,2010)。与厚生劳动省的界定相比,内阁府的定义更为细化,外延也更加宽泛。

第二,学界的界定。目前,应用广泛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精神科医生斋藤环的定义。1998年,斋藤环指出,蛰居不是由精神障碍引发的,而是因校园欺凌、“不登校”<sup>①</sup>就业受挫或职场压力等社会性因素引发的青春期问题,即“社会性蛰居”(social withdrawal)。斋藤环将蛰居定义为“近30岁(有这种状况)被视作存在问题,闭居在家且不参加社会活动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很难认为其他精神问题是其首要原因”(斋藤环,1998:25)。斋藤环第一次指出存在着大量的非精神障碍性蛰居者,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此概念经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颇具影响力。也是此后日本社会各界讨论蛰居问题时必提及的概念。

2000年以来,伴随着蛰居现象的社会问题化,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成果也随之问世。代表性定义之一是荻野达史、川北稔等社会学家在共同撰写的论文集集中的界定“围绕‘蛰居’这一模棱两可的词语,此前涌现出的各种讨论与援助活动等诸多实践,以及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的多数人的经验才是我们思考的‘蛰居’”(荻野达史等,2008:6)。荻野等将蛰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把握,关注的重点是与蛰居相关的各种实践活动。井出草平在《蛰居的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本书基于社会学的立场对蛰居的定义是‘社会行为的丧失’”(井出草平,2007:93)。这一界定显然过于简单。2012年,井出草平在其博士论文《蛰居的社会学研究》中对蛰居做了新的界定,即“不与家人以外的他者进行交往,不工作,不上学等,在社会活动和职业方面存在障碍,且精神障碍不是第一原因”(井出草平,2012:14)。与斋藤环的界定不同,社会学视角的概念未对蛰居期间做具体的限定。

第三,援助团体的界定。蛰居现象萌芽之初,最早接触到此现象的是援助不登校等问题的民间团体。其中富田富士也和工藤定次是比较早关注蛰居现象的民间援助机构负责人。富田对蛰居概念的界定为“逃避学校、社会、熟人,甚至于连父母也回避,拒绝人际关系的行为”(富田富士也,1992:28)。富田从“交流障碍”的视角来分析和界定蛰居,认为蛰居者是在人际关系上存在心理障碍的人。如不擅长、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或者对人际关系存在不信任感,导致一些青少年从不擅长人际交往,进一步发展到害怕与人接触,最终走向拒绝一切人际关系的蛰居之路。

与富田强调人际关系上的蛰居相比,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法人青少年自立援助中心(简称YSC)理事长工藤定次关注的是狭义上的纯粹蛰居者,其将蛰居界定为“闭门不出=独自的空间”与“退出=从社会或人际关系中退出”相叠加,从而“避开他人创造自我空间,逃避与社会的交往”的状态”(工藤定次等,2004:13)。工藤认为社会关系的退出与空间上的闭居是蛰居的两

<sup>①</sup> “不登校”是日语中描述小学和初中生拒绝上学(疾病或经济原因除外)的专有词汇。其前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学校恐惧症”。后来通称为“登校拒否”。80年代以后,逐渐使用“不登校”这一用语。1992年,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开始用“不登校”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不过,现在依然有使用“登校拒否”的学者。本文为叙述方便,统一使用“不登校”一词。

个基本要素,只有完全与社会脱离,闭居在自己家中或房间内不外出的人才能称其为蛰居者。这种蛰居者基本上断绝了与家人及外界的联系,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的隔绝状态中,是一种空间和人际关系上的双重蛰居。

结合日本社会各界对蛰居概念的界定,本文所指的蛰居是因社会性因素而引发的“社会性蛰居”,是一种消极的生活状态,而非精神疾患。具体定义为:由于社会性原因,长时间回避社会活动(包括上学、就业及与家庭外的人际交往等),自我切断与他者的联系(包括家庭关系),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消极生活状态。蛰居青少年失去了上学、工作等参与社会的机会,没有正常的社会交往,仅与家人保持最低限度的交流,甚至与家人也尽量避免接触,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

## (二) 相关文献综述

蛰居在日语中被称为“ひきこもり”(hikikomori),其字面意思是躲在家里,闷居或闭居。蛰居社会问题化之初被认为是“现代孩子的心理问题,也是日本特有的社会现象”(町沢静夫,2003:3)。实际上,蛰居现象并非仅存于日本。英美等欧美发达国家中也存在与蛰居相似的现象(奥山雅久,2003)。韩国等东亚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蛰居人数均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介绍蛰居现象的论文已见诸学界。1985年10月发表的“一个青年蛰居者的旅程”(谷野幸子、一丸藤太郎,1985:145-164),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蛰居问题的学术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不断增多的蛰居现象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关注。1989年出版的《青少年白皮书》中已提及蛰居问题。1994年,日本精神卫生学会出版的杂志《心与社会》中开设了蛰居特集,其中介绍了清水将之和稻村博对蛰居病例和孤立者症候群的研究(畠中宗一、武藤清荣,2008:147)。2000年前后,由疑似蛰居者实施的恶性犯罪案件接连发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以此为契机,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加大力度对蛰居问题进行宣传。很多报道将蛰居与犯罪联系在一起,称蛰居为“犯罪的温床”,蛰居者为“犯罪的预备军”,引起社会恐慌和不安。此时,学术界也出现了研究蛰居问题的热潮,仅2001年就有36本研究蛰居问题的专著问世(石川良子,2007:45)。

在日本,最早发现和接触蛰居现象的是援助机构。由民间团体和医疗机构等援助组织开展的实证研究,旨在帮助蛰居青少年实现自立,重新回归社会。其中,工藤定次创办的法人青少年自立援助中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民间援助团体之一。该中心采用寄宿制,通过家庭访问劝导蛰居者离开家,到法人青少年自立援助中心中进行集体生活,期间规范蛰居者的作息时间,让其体验各种工作,最终实现逐渐回归社会的目的(工藤定次等,2004)。实证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解决蛰居问题,对蛰居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关注较少。

在已出版的众多研究成果中,精神分析视角居多(斋藤环,1998;近藤直司、长谷川俊雄,1999;町沢静夫,2003;中垣内正和,2008)。其研究重点以临床上接触到的蛰居案例为对象,主要分析蛰居的症状、诱因、特征及其与精神疾病的关系,从而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应对指针也将蛰居定性为“精神卫生问题”,且特别强调对“精神障碍性蛰居者”进行药物治疗的必要性(齐藤万比古,2010)。

日本社会学界对蛰居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且集中于对民间团体、援助对策及蛰居经历等问题的考察(荻野達史等,2008)。井出草平是从社会学视角探讨蛰居问题的代表学者之一。他认为将蛰居问题完全归于精神卫生问题是错误的,有必要从社会学视角分析青少年蛰居的原因(井出草平,2012:43-44)。不过,井出草平仅从教育制度入手分析蛰居的原因,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此外,中国学界对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的研究多是零散的、介绍性的,缺少宏观架构上的深入解析。因此,有必要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全面考察蛰居问题产生的社会机理。本文主要利用日本政府的调查数据及相关文献资料,在综述日本蛰居问题概况的基础上,选取一定的蛰居案例对蛰居类型进行微观解读。同时,将蛰居问题置于战后日本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分析其产生背后的社会机理。

## 二、日本蛰居青少年的规模

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以来,尤其是2000年前后蛰居问题社会化之初,关于蛰居者的人数,社会上流传着几万、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等不同的说法,可谓众说纷纭。因蛰居者社会行为丧失及问题自身的隐蔽性、私密性和敏感性等特征,很难准确地把握蛰居的现状。目前,日本政府主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蛰居实态调查主要有厚生劳动科学研究团体开展的“关于精神健康的流行病学调查”(简称“WMH-J调查”)<sup>①</sup>和日本内阁府的抽样调查。

### (一) 关于精神健康的流行病学调查

2002-2006年,作为世界精神卫生(world mental health,缩写为WMH)调查<sup>②</sup>的组成部分,日本开展了WMH-J调查。与其他国家的调查不同,日本的调查项目中追加了对蛰居的调查。WMH-J调查使用的蛰居概念以人际关系的缺失为标准,即不去工作或上学,且与家人以外的人基本上没有交流,持续6个月以上闭居在家的状态,包括偶尔外出购物的情况。此次调查持续4年(2002-2005年),通过面试随机抽取1660名年龄为20-49岁的人,询问其是否有蛰居经历。另外,向4134名全体调查对象,询问其目前是否有蛰居状态的孩子。调查结果显示,曾有过蛰居经历的人为19人,所占比率为1.14%。开始蛰居时的平均年龄为23.6岁,平均蛰居时间为11.8个月。4134名调查对象中,回答有蛰居状态孩子的有23人,蛰居者的平均年龄为28.8岁。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考虑,意味着在4134户家庭中有23户家庭存在蛰居者,所占比率为0.56%。由此推测出,2003年(该年日本的家庭总数为4580万户),全国有蛰居状态孩子的家庭约有26万户(4580万户家庭中的0.56%)(小山明日香2007:120-121)。上述调查结果意味着,大约每180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存在蛰居者。

WMH-J调查是最早的蛰居实态调查,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具信赖性的蛰居现状调查。2010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新指针”也使用了上述数据。并根据0.5%存在蛰居状态孩子的家庭比率,推测出2006年3月底(此时的家庭总数为51102005),有蛰居状态孩子的家庭数为255510户(齐藤万比古2010)。也就是说,2006年日本约有26万个家庭中存在处于蛰居状态的孩子。

### (二) 日本内阁府的抽样调查

日本内阁府于2010年和2015年先后两次开展了全国性蛰居实态调查。2010年,日本内阁府委托“社团法人新信息中心”开展了“关于年轻人意识调查(蛰居的实态调查)”的全国性调查。<sup>③</sup>同年7月公布了《关于年轻人意识调查(蛰居的实态调查)报告书》。此次调查将对象细分为蛰居群、蛰居亲和群和一般群。所谓蛰居群就是已经处于蛰居状态的人群,包括狭义蛰居者和准蛰居者。调查结果显示:狭义蛰居者和准蛰居者所占比率分别为0.61%、1.19%,即在日本总务省2009年推算的3880万15-39岁人口中,狭义蛰居者、准蛰居者的人数分别为23.6万人和46.0万人。广义蛰居者为狭义蛰居者和准蛰居者之和,即69.6万人(所占比率为1.79%)。所谓蛰居亲和群,简单来说就是理解蛰居者或自己也有蛰居想法和倾向,但未进入蛰居状态的人,其推算数约为155万人(内阁府政策统括官2010)。可见,日本青少年蛰居现状已十分严峻,蛰居群已多达约70万人,更令人担心的是,作为“后备军”的蛰居亲和群规模更为庞大。并且,因抽样调查的局限性,实际

① 该调查历时5年,从全国11个地区,以家庭为单位随机选取4134名(平均回收率为55.1%)调查对象。

② 世界卫生组织(WHO)主导的调查,是对发生频率比较高的情绪障碍、不安障碍等精神障碍的国际共同研究。主要在29个国家中开展,是以抑郁症或不安障碍为首的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③ 该调查于2010年2月18-28日进行,随机抽取居住在日本市町村的年满15-39岁的5000人作为调查对象,有效回收率达65.7%(3287人)。

数字可能还会更高。

2015年,日本内阁府开展了“关于年轻人生活”的全国性调查。<sup>①</sup>其结果为:狭义蛰居者和准蛰居者所占比率分别为0.51%和1.06%。根据2015年日本总务省推算的15-39岁人口总数(该年龄段人口总数为3445万人)推测,这一人群中,狭义蛰居者、准蛰居者的人数分别为17.6万人和36.5万人。广义蛰居者为狭义蛰居者和准蛰居者之和,即54.1万人(占该人群的比率为1.57%)(内阁府政策统括官2016)。与2010年调查得出的69.6万蛰居者相比,蛰居人数减少了15.5万人。此外,这次调查对因精神分裂症而蛰居的人数进行了统计(约为2.2万人),如果加上这部分人,蛰居者的推算值达到了56.3万人(内阁府政策统括官2016)。

2015年调查的可信度受到质疑。一是认为此次调查之所以会出现蛰居人数的减少,与调查对象的设定有关。2010年的调查中,30多岁的蛰居者已占很大的比率。而此次调查却将这些已经超过40岁的蛰居者排除在调查对象之外。<sup>②</sup>二是主妇、主夫等专门从事家务和育儿的人被排除在调查对象之外,而这部分人中也可能存在蛰居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24岁的蛰居者人数比6年前增多了约13%,所占比率高达34.7%(内阁府政策统括官2016)。这说明5年来,出现了很多新的蛰居者。由此推测,在原有蛰居者未大量回归社会的情况下,蛰居人数不会大幅度下降。因此,并不能轻易断言青少年蛰居人数在减少。

对比WMH-J调查和内阁府的调查,2010年内阁府调查中狭义蛰居者的人数约为23.6万人,这与WMH-J调查推算出的约26万户家庭存在蛰居者的数字大体相当。不过,井出草平认为,内阁府以“外出的有无”作为判定蛰居者的标准,容易将蛰居问题扩大化。比如有可能将“有工作,但私底下不怎么和他人交往,平时在家”的人也计算在蛰居者中。因此,井出草平认为以“人际关系的有无”作为判定标准的WMH-J调查更为准确(井出草平2012:16)。笔者认为,无论是WMH-J的调查,还是内阁府的调查,因判定标准不同,推测出的蛰居人数也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日本的蛰居者已高达数十万人,其严重性已不容忽视。

### 三、日本青少年蛰居类型的案例解读<sup>③</sup>

综上所述,日本青少年的蛰居问题十分严峻。那么,日本青少年的蛰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本部分试通过具体的蛰居案例,微观解读日本青少年蛰居的具体类型,以期更直观地了解日本青少年蛰居者的基本生活状态。蛰居者的表征相似,诱因却千差万别。性格孤僻自卑、学业问题、家庭问题、工作压力等都容易让人陷入蛰居生活。本文对蛰居的分类主要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相关调查报告及文献资料对蛰居诱因的解读,大体上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 (一) 性格自卑型

性格自卑型蛰居主要由自卑感等自身性格因素引发的。很多蛰居者的性格和行为倾向具有一些共性,如不成熟、幼稚,以自我为中心;对母亲百依百顺,依赖性强,缺乏自信心;性格内向、消极,人际关系方面比较敏感,警惕性强;规规矩矩,爱较真,缺乏变通性;容易自责,自尊心强且容易产生不安情绪等。他们容易拘泥于小事情,过度在意周围人的看法,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善于交朋友。这些性格特点在每一个蛰居者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而自卑型蛰居者的自身性格因素是

<sup>①</sup> 该调查于2015年12月11-23日进行,随机抽取居住在日本市町村的年满15-39岁的5000名年轻人及其家人为对象,年轻人的有效回收率达62.3%(3115人)。

<sup>②</sup> 对于为什么将40岁以上的蛰居者排除在调查对象之外,内阁府的回答是“40岁以上是厚生劳动省的工作范围”,对于这种解释,很多人表示无法理解。

<sup>③</sup> 本文所使用的案例主要来源于日本新闻媒体、援助机构及学者的调研资料。为了行文统一,本文对引用的案例在忠实于原有内容的基础上,略作概括,用A、B、C、D、E标记。

主要诱因,一旦周围环境发生改变,自身又无法适应时,就可能走上蛰居之路。

案例 A,男,33岁。A从大四时开始蛰居,在房间内蛰居了4年,期间连父母也不见。一想到自己的未来,A就感到无比的绝望,曾有过自杀的想法。A自懂事起就有劣等感和自卑感,认为自己不如人,非常讨厌自己,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羞愧。实际上,A并不比别人差,周围也不存在让自己有劣等感的理由。为了减轻自卑心理,小学阶段的A非常努力地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他还积极参加学校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等。通过各种努力,A找回了一些自信。但是上大学后,生活环境的改变让A无所适从。他发现自己自小存在的自卑心理一点也没有改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这种自卑感引发了抑郁,自杀未遂后,A的抑郁症状加重,最终走上了蛰居之路(NHK「ひきこもりサポートキャンペーン」プロジェクト 2004: 18-19)。

A从小就有自卑心理,缺乏自信。虽然通过努力学习,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缓解了自卑情绪。但是上大学后,周围环境的改变,又使其自卑心理增强,从而引发抑郁症,最终走上了蛰居之路。

## (二) 学业受挫型

当今日本青少年不仅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在父母的过度保护下成长,抗挫折能力差。他们一旦在学业上或者交友方面受挫,很容易采取逃避的方式来应对。蛰居便成为其逃避挫折的一种消极生活方式。蛰居者中,因考试失利、不登校、校园欺凌等校园问题走上蛰居之路的青少年占较大的比例。

案例 B,男,19岁。B小时候性格活泼开朗,有过很多朋友。中考时,B没能考上理想的公立高中。进入私立高中的B,情绪非常低落。高二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时,因偷了老师的文字处理机而退学。此后,虽然也去预备学校上学,准备报考大学。但因预备学校成员复杂,最终放弃,蛰居在家。B十分在意周围人的目光。因家附近有很多亲戚,所以B不愿意出门,一直闭居在家,平时一直关着窗户,只有周末才开窗晾晒被子。B经常对家人发脾气,甚至发展到不能和父亲一起吃饭,长时间蛰居在自己房间里(富田富士也,1992: 47-50)。

B本来是性格非常开朗的孩子,因升学问题,性格发生了改变,最终不得不中途退学,蛰居在家。

## (三) 家教偏颇型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形成了“学历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强调学历主义的氛围下,学历成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不断提升,学习和成绩成为父母关注的重点,家庭教育的偏智育倾向进一步增强。在父母的高学历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日本青少年从小形成了“优秀的学习成绩,然后上好学校,进大公司,努力成为工薪阶层”的价值观,并为之努力奋斗。在这种单一价值观的束缚下以及父母过高期待的家庭教育下,日本青少年一旦成绩下滑或考试失败,很容易一蹶不振,成为蛰居者。

案例 C,男,19岁。C的父亲崇尚“出息发迹、学历主义”的教育理念。每当C的成绩下降时,母亲都会受到父亲的责备,偶尔还会遭受家庭暴力,曾发生过母子夜晚流落街头的事情。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C升入了重点高中。周围同学都是“以一流大学为目标”,这给能力不足的C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刚入学一个月,C就因腹痛、头痛、恶心等开始请假。C认为,如果中途退学就辜负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会成为母亲的耻辱。在紧张和不安中,C长期缺课的事情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害怕被父亲知道的恐惧,以及近邻的“白眼”让C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个暑假前,C向父亲表达了要退学的想法,但父亲说了句“去死吧”,便离席而去。几个

月后,C开始闭居在自己房间里,不与家人见面,渐渐地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富田富士也,1993:111-112)。

C是在偏重智育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其父亲强势的学历主义教育下,C害怕让父亲失望,上了与自己能力不相称的重点高中。然而,在无法继续学业想退学时,却得不到父亲的理解。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C走上了蛰居之路。

#### (四) 就业遇挫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因就业遇挫或不能适应职场环境而蛰居的人不断增多。2010年内阁府开展的“关于年轻人意识调查(蛰居实况调查)”结果显示,除生病外,不适应工作环境和就业受挫是年轻人走上蛰居之路的主要原因,所占比率分别为23.7%和20.3%(内閣府政策統括官2010)。

案例D,男,30多岁,在大公司从事技术工作。某天D在进公司大门时,心跳突然加快,情绪低落,无论如何也不能走进公司大门,最终只能折回家中。他一个人住在市中心的高级公寓中。D过去从来没有过不登校的经历,工作以后身体状况一直也很好。但是,D工作中的压力很大,领导分配的研究课题太难,D为此失眠和焦虑不安。因时常受到领导斥责,D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经过治疗后,D的失眠症状得到改善。但是,还是不能出勤,最后不得不辞职。辞了工作的D和公司断绝了关系,很有可能蛰居在家(池上正樹,2014:40-42)。

案例E,男,29岁。E大学毕业后,进入当地的公司工作,但只工作了一个月就辞职了。下一份工作也仅仅维持了半年。此后,E又先后找了几份工作,但都因无故缺勤或失联而最终被辞退。E最后过上了闭居在家的蛰居生活(斎藤環,1998:21)。

D和E均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或不适应工作环境而走上蛰居之路。尤其是E,对工作没有热情和耐心,经常无故缺勤,反复辞职后,闭居在家过起了蛰居生活。

以上是笔者对日本青少年蛰居现象的粗略分类,由于涉及个案有限,可能不能涵盖所有的类型。这些蛰居问题是性格、学业、家庭、就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四、日本蛰居问题产生的社会机理

鉴于蛰居诱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将把蛰居问题的原因分析放置于战后日本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考察蛰居问题的历史演变轨迹和社会机理。社会变迁是认识和理解青少年蛰居问题的重要背景。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辛自强、池丽萍,2008:23),即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战后日本经济复兴后,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产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并于20世纪70年代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的私性化(privatization)<sup>①</sup>、核心家庭中“父职的缺失”<sup>②</sup>、学校教育病理及频发的校园问题等成为青少年蛰居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

① 社会的私性化是指与现代社会中个人私生活优先这一原则的普遍化相关联的个人—社会关系的变化。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曾经将人们同团体及他人联结在一起的传统纽带逐渐松弛,人们开始同团体和他人保持距离,不愿自己的私生活被他人涉足,也不再愿意被团体和人际关系完全吞没。参见陈映芳,2002,《个人化与日本的青少年问题》,《社会学研究》第2期。

② 所谓“父职的缺失”是指子女与母亲关系密切,而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 (一) 社会变迁与蛰居问题的演变

在战后日本从初期的贫困到经济高速增长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然后又陷入经济低迷的变迁过程中,日本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些宏观的社会变迁是日本蛰居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70年代,已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进入了富裕社会。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裕程度,绝大多数国民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已达到“中流”水平。生活的富裕和城市化的发展,改变了大众的社会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大众追求个人生活和家庭幸福的私性化趋势逐渐增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家庭主义”<sup>①</sup>生活方式占据主流模式,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日渐疏离。富裕的社会和逐渐私性化的社会环境对日本青少年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青少年提供了富足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个人化、自我中心主义及个体发展等价值观受到推崇和张扬。伴随着青少年生活环境的变化和个人主义意识的增强,“无气力症”(Apathy)<sup>②</sup>“延缓成为社会人”(モラトリアム[moratorium])<sup>③</sup>等青少年偏差行为逐渐增多。不登校、校园暴力等教育问题凸显。因不登校与蛰居有很强的关联性<sup>④</sup>,由此可推测出作为不登校延长线上的蛰居现象至少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此时一些援助不登校学生的民间团体和精神科医生已经接触到类似现象的年轻人。因当时还未出现“蛰居”一词,描述这一现象的词汇有“对人恐怖”“无气力症”“延缓成为社会人”等。他们对学业和职业生活不感兴趣,不参与社会活动,无所作为地虚度光阴。蛰居现象的萌芽成为日本社会变迁中青少年行为偏差的真实写照。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泡沫经济的膨胀与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使精神世界的荒芜现象愈益凸显。“新人类”<sup>⑤</sup>现象、“尊重私生活主义”“寻找自我”等词语成为解读现代社会的关键词。这与日本社会深层发生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变化是指整个社会结构及人们的意识逐渐呈现出“个人化”(private)即“私性化”(森田洋司,2005:11)。一直以来支撑日本社会的“努力”“合作”等价值观在新一代年轻人中出现了动摇。他们不再视认真、勤奋为真理,代之的是享受现在和忠实于自我的生活。以追求自我为代表的社会私性化趋势进一步增强,人际关系愈发淡漠。年轻人的人际关系逐渐表面化,彼此之间保持着有距离的、不涉及私人生活的交往。在人际关系淡漠、升学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校园欺凌等学校问题日益凸显,不登校现象愈演愈烈。自1975年以来,日本不登校人数基本上呈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从1975年的10534人增长到1988年的42401人,增长了四倍多(文部科学省,2002)。由此可以推测出作为连锁反应的蛰居现象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增多。

20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泡沫经济崩溃后面临全面转型的多元化时代。经济低迷,失业率攀升,非正规雇用增多,原来被富裕生活掩盖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年轻人的就业环境进一步恶化,“自由职业者”增多,“啃老族”群体扩大。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消极、忍耐力低、缺乏责任感。他们不愿意面对社会上的残酷竞争,蜗居在自己的角落里,封闭自己,不与他人发生任何联系,以此来逃避社会责任。蛰居成为年轻人逃避现实生活,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

① 日语为“マイホーム”(Maiho-mu),是指家庭至上,享受自己小家庭生活的“主义”。

② “无气力症”,是指缺乏朝气没有热情,对事情不感动,也不关心的无所作为的状态。参见稻村博,1989《若者・アパシーの時代——急増する無気力とその背景》,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③ モラトリアム是经济学用语,原意为“延期偿付”,是指一定期间内延期执行债权或债务的措施。这里指年轻人以学业、研修为由,暂时延期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参见小此木啓吾,1978《モラトリアム人間の時代》,东京:中央公論社。

④ 从现有的蛰居实况调查来看,60-90%的蛰居者具有不登校的经历,很多蛰居者是经历长期不登校后,开始走上蛰居之路的。参见井出草平,2007《ひきこもりの社会学》,京都:世界思想社。

⑤ “新人类”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描述年轻人的时髦用语,并获得了1986年的“流行语大奖”金奖。所谓“新人类”,是指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出生于电视普及的年代,从小在媒体环境中成长的他们,具有上一代人没有的良好媒体素养。与人际交往相比,他们更喜欢一个人玩媒体游戏,成为私生活优先的个人主义者。

典型。此时,因就业受挫而蛰居的事例逐渐增多,激增的蛰居现象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至此,蛰居完成了由隐性现象向显性社会问题的转化,成为公众话题和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21世纪以来,低迷的经济环境、终身雇用制度的瓦解,使日本社会的差距不断扩大,年轻人群中出现了两极分化,作为青少年“无缘化”<sup>①</sup>现象代表的蛰居问题成为当今日本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

蛰居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从萌芽、增多到社会问题化的演变过程,是日本步入富裕社会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变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映。日本社会富裕后,经济宽裕、衣食无忧为蛰居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同时社会私性化带来的人际关系淡薄、个人主义意识增强成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障碍,泡沫经济崩溃后就业压力的增大则加速了蛰居社会问题化的进程。

## (二) 家庭结构变迁与蛰居的家庭因素

蛰居者在正常的社会化中断或受挫后,切断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丧失了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和人际关系,逐渐出现沟通困难和社会化障碍,最终封闭自我,成为依靠父母供养的寄生族。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一,在青少年蛰居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后日本向现代化过渡的急剧变迁中,产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使传统的以农业和自营业为主的大家庭不断减少,代之以工薪阶层为主体的核心家庭迅速增多。城市化、核心家庭化及随之形成的小家庭主义淡化了血缘亲情和邻里关系。与传统大家庭相比,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代家庭中的人际关系趋于简单,祖辈和孙辈的关系也日益淡化。核心家庭本身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孤立性,小家庭主义背景下形成的私人生活优先价值观进一步弱化了家庭之外的交流。地域失去了连带感和共同体意识,邻里之间疏于往来,个人主义和家族中心主义凸显,人际关系愈发淡薄。家庭的闭塞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使得日本青少年的家庭成长环境变得寂寞和孤独。孩子的独处时间增多,人际交往减少。而不外出和拒绝与人交流正是蛰居者的典型特征。

在核心家庭化的同时,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终身雇用制企业雇用体系的确立,强化了日本家庭结构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模式。其典型特征是,丈夫在外工作,挣钱养家;妻子则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父亲角色主要停留在家庭生活来源的支撑者,缺乏承担育子责任意识,导致家庭教育中“父职缺失”现象严重。很多青少年是在父亲角色缺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主要表现为,日本家庭中父亲形象日趋矮小,家庭教育中父亲发挥的作用有限。家庭角色分工将父亲的本职定位于养家糊口,工作是他们的生活重心。被称为“工作狂”的父亲,一心理头于工作,无暇照顾家庭。日本企业存在的长期加班等问题,使得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非常有限,进一步弱化了父亲的家庭角色。与父亲的工作优先相比,妻子则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以家务和育子为主。家庭生活中“父职缺失”的同时,母亲承担着几乎全部的育子责任,母子为中心的育子方式得以确立。这种“父职缺失”的家庭育子环境不利于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培养和自立意识的形成。父亲角色的缺失对孩子性格的培养不利,容易出现性格柔弱、孤僻、自卑、任性、社交恐惧等心理障碍,而母子为中心的育儿方式引发的过度保护和干涉等问题容易助长孩子的依赖心理,严重影响青少年自立。

蛰居者的家庭有着相似的特征,绝大多数是“公司职员的父亲和专职主妇的母亲”的组合方式。蛰居者的父亲多是沉默寡言,热心于工作的工薪层,与孩子接触的时间少,更谈不上对孩子的管教,在家庭中的存在感低。蛰居者的母亲一般分两种类型,过度保护型和教育妈妈型。过度保护型母亲尽力满足孩子的各种欲求,孩子的自立性和社会适应性不成熟,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缺乏应对挫折的能力。教育妈妈型母亲则往往对孩子的期望过高,干涉和限制过多。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缺乏主见,压抑自己的欲求,为满足父母或周围人的期待而拼命努力。在过

<sup>①</sup> “无缘化”是指青少年成长中血缘、地缘、学缘和社缘等各种人际关系的弱化。参见师艳荣,2015,《日本青少年“无缘化”现象解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2期。

度压抑自我的成长过程中,性格很容易出现问题,变得敏感、追求完美,自尊心过强,不允许自己失败。这些孩子在父母、邻居及老师眼中是成绩优秀的“好孩子”,但是他们的内心却非常脆弱,抗挫折能力低,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一蹶不振,走上不登校,甚至蛰居的道路。

家庭本应成为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在与家人的交流和生活中培养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然而,战后日本核心家庭化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及“父职缺失”的家庭育子环境,逐步弱化了家庭的社会化功能,使得家庭沦为青少年蛰居的温床。

### (三) 校园问题频发与蛰居的学校因素

学校是学习知识和结交友情的重要场所,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确立了民主化的现代教育体制。然而,为了迎合经济发展目标,学校教育被纳入培养适合经济发展人才的轨道。战后日本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管理主义、学历主义、考试竞争及单一的偏差值<sup>①</sup>评价标准等教育病理,弱化了学缘关系,不利于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培养,也是不登校进而蛰居的不可避免的因素。

蛰居者中有半数以上具有不登校的经历,而不登校问题与日本应试教育和管理主义背景下形成的学历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考试竞争、偏差值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管理主义强调同质性和集团性,忽视了差异,使得张扬个性的学生受到排挤和欺凌。学校生活被整齐划一、僵硬的规则束缚着,剥夺了孩子的自我,压抑了青少年的个性。对学历主义和名校的过度追求,引发了激烈的考试竞争以及无休止的补习班和兴趣班,使得很多学生不堪重负,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些学生因此产生考试焦虑、厌学情绪以及学校恐惧症。学校生活对青少年来说失去了应有的魅力,相反学生的精神压力和对学校的疏离感增强,不适应学校生活的学生日益增多。偏差值教育培养了社会精英,却忽略了人际关系的培养。很多偏差值高的人并不擅长人际交往,在人际关系方面成为了“落后生”。学习好的孩子,虽然能让父母感到自豪,但在同学中间却得不到友情的满足。那些应考学校的学生,或是一心只为升学的高中生,通常没有亲密的朋友,由此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感。学习好的孩子确实有毅力和自信心,对学校生活、对理想中的自我感到满足,但他们同时也会感到精神上的疲劳和强烈的孤独感(千石保,1985:135-136)。很多青少年学习能力很强,但因人际交往能力不足,难以适应社会,最终走上了蛰居之路。

学校教育病理及频发的不登校等校园问题成为青少年走上蛰居之路的重要诱因之一。20世纪70年代,在升学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校园问题日益凸显。不登校人数呈滚雪球式增长,作为连锁反应的蛰居现象随之萌芽。80年代,校园欺凌等校园问题频发,学校成为竞争和欺凌的温床,不登校问题日益严重,青少年蛰居现象也随之增多。泡沫经济破灭后,以不登校为首的各种校园问题愈演愈烈,蛰居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日本校园问题严重化的过程,也是青少年蛰居现象从萌芽、增多到社会问题化的过程。

日本社会对不登校学生普遍存在歧视心理。对这些不登校的孩子来说,出路只有两条:一是重新回到学校;二是出去工作。实际上,这两条出路都难以实现。因为一旦不登校,再重新回归学校将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并且,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上学、获取学历、谋求好工作才是正常的生活轨迹。那些因学业成绩、同学关系而不登校的学生,存在着极大的挫败感。在学校文化独占度非常高的日本,不登校就意味着被孤立,没有了朋友,难以在社会上立足,成为社会的落伍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参与社会和发展人际关系存在抵触情绪,即使成年后,也只能靠打短工维持生活。而那些未就业的不登校者,越来越脱离社会,甚至长期闭居在家,完全依靠父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蛰居成为一些不登校者逃避学业和社会竞争的生活方式。

<sup>①</sup> 所谓“偏差值”是相对于平均分数的偏差数值,是用来确定每个学生在全考生中所处位置的数值。计算公式为:(考生个人得分-全体考生的平均分)/标准差×10+50。在日本,学生的考试成绩决定着其偏差值的高低,而偏差值又成为评价学生学习能力的标准,也是学校选拔录取学生的依据。

总之,战后日本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学历主义等教育病理及频发的校园欺凌、不登校等校园问题成为青少年走上蛰居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五、蛰居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镜鉴

日本青少年蛰居不仅仅是个人病理现象,也是战后日本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由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造成的社会病理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青少年在其成长过程中,应该通过家庭、学校和职场等社会教化机构完成社会化,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人。但是,在战后日本社会变迁中,社会私性化和个人化的不断发展,核心家庭中“父职缺失”的家庭育子方式,学校教育病理及频发的校园问题等,逐渐弱化了社会教化机构的社会化功能。一些青少年从学校、职场等个人社会化不可缺少的领域中自我退却,社会化过程中断,这种中断带来的严重后果便是蛰居问题的产生。

战后日本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个人的自主、自立精神得到不断的提升,同时,人际关系也出现了危机。战后日本社会富裕后,社会秩序稳定,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准提升,中产阶级扩大,国民生活水平不相上下。然而伴随而生的是人们对隐私权的关注和自我意识的增长,整个日本社会朝着私性化方向发展,人际关系随之出现了危机。家庭羁绊、邻里关系、同窗友情、同事之缘等人际关系纽带逐渐松散,甚至迈入解体的边缘,日本社会逐渐走上了“无缘社会”的深渊。<sup>①</sup>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无缘化”已经蔓延至日本青少年群体,蛰居问题就是“无缘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最突出体现。在社会现代化不断发展,而人际关系危机日益加剧的无缘社会背景下,蛰居成为日本青少年面对人际关系困境而采取的自我保护的极端措施之一。社会发展带来的人际关系危机既是蛰居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蛰居问题的本质。

近年来,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蛰居者有增多的趋势。对同处东亚社会且正处于快速经济发展期的中国来说,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的严重性给中国带来了警示。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日本蛰居现象萌芽之时十分相似,处于生活富足后社会压力不断增大的转型期。伴随着社会变革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其生活环境、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学历主义至上、考试竞争加剧、父母对孩子的过高期待及过度保护等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很多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不断强化智力教育,却忽视了对孩子良好品格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享受着富裕生活的当代青少年却承载着过重的学习压力。另一方面,在亲子关系的物质化、金钱化倾向增强的同时,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导致没有担当、不能吃苦、注重享受的啃老族群体不断扩大。并且,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核心家庭的增多、家庭规模的缩小、校园问题的频发以及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淡薄,青少年在人际交往、自立意识及抗挫折能力等方面的弱化趋势比较明显,社会化困难随之加大。不久的将来,中国面临的青少年蛰居问题有可能变得严峻。如何预防和应对未来可能增多的青少年蛰居问题,将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此外,日本青少年蛰居现象之所以从个别案例发展到目前数十万的规模,与日本当初对问题的重视不够有着密切的联系。蛰居现象萌芽之初,日本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蛰居现象日益严重之时,很多人仍抱着观望的态度,政府在应对蛰居问题上也有着明显的滞后性。2000年左右蛰居社会问题化后,日本政府才积极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出台应对举措,这无形中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21世纪以来,愈发严重的蛰居问题引起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有关蛰居的区域性调查和全国性调查相继展开,日本政府、NPO法人等民间团体也积极开展对蛰居者及其家人的援助活动,但收效甚微,至今依然没有找到根治的良策。中国青少年蛰居现象已经萌芽,但尚未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避免出现日本这样严峻的事态,中国应以日本为戒,及早发现问题,寻索原因,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sup>①</sup> 所谓“无缘社会”泛指人际关系的疏离,源于因血缘、地缘、社缘等各种“缘”的解体而引发的“无缘死”现象。参见师艳荣2015,《日本青少年“无缘化”现象解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2期。

## 参考文献:

- 吴忠民 1991,《国外历史社会学述论》,《社会学研究》第1期。
- 辛自强、池丽萍 2008,《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奥山雅久 2003,“先進国に広がっているHIKIKOMORI。”旅立ち(17)。
- 池上正樹 2014,《大人のひきこもり 本当は「外に出る理由」を探している人たち》。東京:講談社。
- 荻野達史、川北稔、工藤宏司等 2008,《ひきこもりへの社会学的アプローチ——メディア・当事者・支援活動》。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 町沢静夫 2003,《ひきこもる若者たち——「ひきこもり」の実態と処方箋》。東京:大和書房。
- 富田富士也 1992,《引きこもりから旅立ち》。東京:ハート出版。
- 1993,《続・引きこもりからの旅立ち》。東京:ハート出版。
- 工藤定次、YSCスタッフ、永富奈津恵 2004,《脱! ひきこもり——YSCの本》。東京:ポット出版。
- 谷野幸子、一丸藤太郎 1985,“一青年のひきこもりからの旅立ち。”心理臨床ケース研究(10)。
- 近藤直司、長谷川俊雄 1999,《引きこもりの理解と援助》。東京:萌文社。
- 井出草平 2007,《ひきこもりの社会学》。京都:世界思想社。
- 2012,《ひきこもりの社会学的研究》。日本大阪大学博士学位論文。
- 内閣府政策統括官(共生社会政策担当) 2010,“若者の意識に関する調査(ひきこもりに関する実態調査)報告書。”7月(<http://www8.cao.go.jp/youth/kenkyu/hikikomori/pdf/s2.pdf>)。
- 2016,“若者の生活に関する調査報告書。”9月(<http://www8.cao.go.jp/youth/kenkyu/hikikomori/h27/pdf/teigi.pdf>)。
- NHK「ひきこもりサポートキャンペーン」プロジェクト 2004,《hikikomori@NHKひきこもり》。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 斎藤環 1998,《社会的ひきこもり-終わらない思春期》。東京:PHP研究所。
- 齊藤万比古等 2010,“ひきこもりの評価・支援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https://www.mhlw.go.jp/file/06-Seisakujouhou-12000000-Shakaiengokyo-Shakai/0000147789.pdf>)。
- 千石保 1985,《現代若者論——ポスト・モラトリアムへの摸索》。東京:弘文堂。
- 森田洋司 2005,“不登校から見えてくる日本社会と教育の課題。”青少年問題52(2)。
- 石川良子 2007,《ひきこもりの<ゴール>—「就労」でもなく「対人関係」でもなく》。東京:青弓社。
- 文部科学省 2002,“児童生徒の問題行動・不登校等生徒指導上の諸課題に関する調査。”(<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bid=000001022607&cycod=0>)。
- 小山明日香 2007,“地域疫学調査による「ひきこもり」の実態と精神医学的診断について—平成14年度~平成17年度のまとめ—。”川上憲人,“こころの健康についての疫学調査に関する研究平成18年度総括・分担研究報告書。”
- 中垣内正和 2008,《はじめてのひきこもり外来》。東京:ハート出版。
- 畠中宗一、武藤清栄 2008,“日本における「ひきこもり」概念の変遷。”宗像恒次、武藤清栄,《ニート・ひきこもりと親 心豊かな家族と社会の実現へ》。東京:生活書院。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责任编辑:石金群

has become the path for the middle-class families to maintain their class advantages and realize the class reproduction.

**Keywords:** Middle-class Family Family Upbringing Tutorial Class Market-oriented Education

### **The Differences in Moral Expect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

..... *Wang Junxiu( 27)*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moral expect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 ,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xpect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children and parents have higher consistency in moral expectation , especially in personal inherent morals; the parents' moral expectation for children is higher than children themselves; the children's moral disengagement level is higher than their paren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ral disengagement , the males' moral disengagement level is higher than females; the only child's moral disengagement level is higher than the non-only child; the students with high level of social adaptive morals have low lev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 while the students with high level of personal inherent morals have low level of moral disengagement. This study is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towards adolescents.

**Keywords:** Moral Expectation Moral Disengagement Personal Inherent Morals Social Adaptive Morals

### **The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Juveniles' Rights of Speedy Trial and Separated Imprisonment**

..... *Chen Zhe( 35)*

**Abstract:** The article 10 of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has stipulated the juveniles' rights of speedy trial and separated imprisonment , it has provided the full protection to the juvenil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The related opinions and precedents from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nd the Children's Rights Committee have further detailed and optimized these rights , and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juvenile justice across the world. Comparing to the regulations by the United Nations ,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in juvenile justice in China , including the absence and ambiguity of law , the lack of ideas on rights protection , the high rate of pre-trial incarceration , and the low rate of non-imprisonment sentence , etc. We should follow the spirit of 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on rights protection from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higher protection on the juveniles' rights. We need to reform the judicial procedure , improve the trial efficiency , clarify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 and strengthen the social linkage. Hence , we could actually protect the juveniles' rights of speedy trial and separated imprisonmen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Right of Speedy Trial Right of Separated Imprisonment Juvenile Justice

### **The Study on Japanese Adolescents' Hikikomori Problem** .....

*Shi Yanrong( 47)*

**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adolescent problem , the Hikikomori emerged in post-war Japan after realizing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t is also the difficult question met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adolescents' socialization. Currently ,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Hikikomori Japanese adolescents who have lost their social behaviors and isolated themselves from society. The main types include the type of inferiority in character , the type of setback in study , the type of bias in family education , and the type of frustration in employment. The Hikikomori emerged in the social change of post-war Japan , it is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pathology jointly caused by society , family and school. Its underlying social mechanism lies in several factors , includ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privatization" brought b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family upbringing mode of "absence of fatherly duties" in nuclear families , the pathology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frequently occurring school problems , etc. On the basis of general overview of Hikikomori problem in Japan , this paper mainly conducts the study of its

ori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Keywords:** Japanese Adolescents Hikikomori Problem Evolution Process Social Mechanism

**The Reflexiv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Objectification of Sexual Violence**

..... *Wang Wenqing & Pan Suiming( 59)*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Bourdieu’s ideas on reflexive sociology and Habermas’s analysis on the 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sexual violenc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conceptual constitution of sexual violence has obvious imprint of juridification. Regarding the dimension of sexual willingness , it would emphasize the “consent” and ignore the “need”. A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sexual willingness , it would emphasize the “duality” and ignore the “continuum”.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legal logic originates from the juridification in society and the rising status of law.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legal logic ,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sexual violence should examine the daily knowledge of sexual violence and its coping practice , and bring the contents excluded by legal logic into our horizon again.

**Keywords:** Sexual Violence Reflexive Sociology The 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 Legal Logic

**Emotion , Power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Consumption Labor** ..... *Lin Xiaoshan( 69)*

**Abstract:** The daily consumption contains the labor value that couldn’t be ign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 we should revisit the family daily shopping with dual attributes of consumption and labor , it could help us reveal the trial efficiency mechanism for power operation and gender inequality within fami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third “The Survey of Chi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 we find that the factors like conjugal power and emotion involvement , etc. could partly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of labor and consumption within family. Especially after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conjugal power and emotion involvement , we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the families where the husbands have more real power , the more emotion involvement the wives would invest , the less probability the husbands would undertake daily shopping; the more emotion involvement the husbands invest , the more probability the wives would undertake daily shopping. However , in the families where wives have more real power ,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emotion and power does not reduce the wives’ probability of daily shopping significantly , namely the wives always undertake more family daily shopping than the husbands , therefore the gender inequality in consumption labor is reproduced invisibly.

**Keywords:** Conjugal Power Mode Emotion Involvement Daily Shopping Consumption Labor Gender Inequality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in Chile and Its Differences in Dual-generations**

..... *Chen Yongyuan( 82)*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and combining the public archival data , 20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he survey results from 260 questionnaires together , this study tries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in Santiago , Chile. This analysis is conducted from two levels including age generation and immigrant gen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or most overseas Chinese in Santiago , they tend to construct their ethnic identity as Chinese , followed by dual ethnic identity ( both Chinese and Chileans) . Few of them construct their ethnic identity as Chileans. There exists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age generation and immigration generation.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 , the descendants of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are more likely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Chinese , rather than dual ethnic identity or Chilean ethnic identity. However , for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generation ,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couldn’t lead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thnic identity. This paper could enrich the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and provide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expansion of relevant theories.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in Chile Immigrants Ethnic Identity Case Study